

華語圈和日語圈之在地化國關理論建構

Homegrown Theorizing in Sinophone and Japanese IR: Understandably Different, Surprisingly Similar

陳慶昌

龍谷大學國際學部

壹、前言

本文回顧華語和日語國際關係社群關於在地知識生產和理論建構的文獻，並關注兩個社群如何透過在地的想法、經驗和行為，建構與「國際」相關的理論概念。我選擇觀察這兩個社群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它們如 Amitav Acharya 和 Barry Buzan 暗示的一般，或能代表亞洲崛起，¹也對它們是否有潛力突破西伐里亞式現代觀並重新想像國際關係感到興趣。

在此，「華語圈的國際關係」(Sinophone IR) 不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國關研究社群，也包括台灣和其他使用華語的研究者，以及關注「中國」思想和傳統的非華裔學者（根據自主性去，目的未必

* 本文係付印中拙作 “Sinophone and Japa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Patrick James, ed.,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之中文摘要版，詳細書目介紹請參照該文。作者感謝日本學術振興會在研究經費方面的支援（國際共同研究強化 17KK0056），並謹以本文向已故凌煥銘教授（1955-2018）致敬。

¹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是去測試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同理，「日語圈的國際關係」(Japanese IR)也不狹窄地指涉擁有日本國民身分的國際關係學者，包括在日本和海外的國際關係學者，他們皆認真看待「日本」思想和歷史。且這兩個社群之間並無固定邊界，因為如筆者一般，同時研究和分析這兩個社群是可能的。

然而，在此必須提出兩項但書：首先，這兩個社群內的多數國際關係學者，既不在乎也未投入在地化理論之建構；其次，「中國學派」的學者顯然並未試圖從日語圈找尋靈感。無論如何，若干在地理理論研究者已開始從佛教等與另一方之共享資源中進行取材，或從另一方的想法和行為來思考。廣泛來說，理論建構的這股能量和相互影響可望成長，尤其是針對本體論、關係性和時間性等概念。

貳、日語和華語圈國際關係中的「民族學派」爭辯

儘管日本在 1960 年代與中國在 1980 年代，都有關於自主建構國際關係理論的聲音出現，當代對於發展如英國學派一般的「民族學派」(national school) 的興趣，主要源自於回應 Archaya 和 Buzan 在 2007 年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特刊中所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在亞洲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對他們來說，亞洲崛起代表亞洲的領頭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日本，應該曾想要發展自己的理論，以便為自身國家利益辯護。任曉認同 Archaya 和 Buzan 的想法，並對同儕毫無批判地接受美國/西方理論感到憂慮，也促使其率先（共同）提出「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一詞。儘管如此，他相信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國理論之終將出現乃無可避免的。

相對的，豬口孝認為日本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戰間期」中，已出現許多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但或因語言隔閡且受限於狹隘

的實證研究法，致使其從 Acharya 和 Buzan 的視野中「消失」。繼豬口孝之後，儘管清水耕介和其他同好曾試著發掘日本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獨特貢獻，然而個人認為，這些建構日本國關理論的初期嘗試依然困在西伐里亞式的現代性裡，因為他們繼續視西方國際關係為典範，無法加以解構。因此 T. Do 也發現在地化理論的建構工程目前只吸引日本少數的國際關係學者，因為戰後的日本學界對理論建構不感興趣，而日本認同中的「西方性」，也讓發展在地化理論顯得相較不迫切。

Peter Kristensen 呼應了陳慶昌關於「多元化日本國際關係的參照點」的主張，並指出崛起中的中國學派不過正同樣成為擁有中國特質的美式產品。換言之，中國學派論者在尋求和美國主流國際關係對話並贏取其認同之際，卻忽略了其他處於全球國際關係知識生產邊緣的社群，例如巴西和印度等。凌煥銘則從後殖民女性主義角度，批評中國學派的倡議者們以狹隘和粗暴的西伐里亞國家中心邏輯定義「中國」一詞，並在其知識生產的過程中複製父權結構。

本文同意渡邊敦子和 Felix Rosch 的觀察，認為建構在地化理論的終極挑戰是如何不以「特例」或「正常」的態度描述某個政治社群。無論喜歡與否，張勇進和張登及指出，中國學派將在國際關係關於民族學派的辯論中保有一席之地，並在全球知識生產的發展中成為「社會性的現實」。

參、日語圈國際關係的在地化理論建構

Anna Agathangelou 和凌煥銘用「殖民宅邸」(colonial household) 一詞形容國際關係學科在決定誰的知識擁有正當性並能被接受，以及誰的利益和聲音能被代表或聆聽時，所呈現之階級化、狹隘和粗

暴的排他結構。²在此一「國際關係宅邸」(house of IR)中存在某種層級性認識論結構，區域研究即便不在戶外，通常也只能位於下層和邊緣。從學科之跨領域本質，以及許多處理國際關係相關議題之區域研究者未必定義自己是國際關係學者看來，日本的國際關係研究堪稱是個例外。

如同初瀨龍平等代表性學者所公開指出，區域研究者對建構在地化國際關係理論做出莫大貢獻確為事實。例如，透過和中國文學與歷史對話，竹內好反思日本戰時試圖「克服現代性」的失敗，並努力提出某種東西方互動之非對抗性模式；溝口雄三提議將中國視為一種研究方法（而非標的），藉此重新思考世界史的結構問題；至於濱下武志則透過凸顯東亞在經濟現代化歷程中的歷史能動性，把西方國際關係在地化。

又如，大屋根聰及其夥伴試圖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切入，確認日本國際關係學界對外來的西方國際關係到底接受至什麼程度；他們的研究發現，儘管存在一些理論重整，目前程度還無法讓理論「日本化」。援引丸山真男的「反覆固定」(*basso ostinato*)概念，Felix Rosch和渡邊敦子同樣認為，自我和他者早已共生存在一個無法結合的空間，兩者立場都是在不被同化的情形下互相學習。

顯然，如何把認同理論化對日本國際關係學界的在地化理論建構者來說，是個主要問題。Graham Gerard Ong 是最早指出西田幾多郎的哲學有潛力解決當代日本認同危機的先驅之一。清水耕介則警告我們，根據「理論後門」(*theoretical backdoor*)及其倡導者的戰時紀錄，京都學派哲學對非西方國際關係發展具有警示意義。酒井

² Anna M. Agathangelou and L. H. M. Ling, "The House of IR: From Family Power Politics to the Poiesis of World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6:4(2004), pp.21-49.

哲也試圖追溯戰前日本相較其他東亞國家，如何首先擺脫亞洲的層級性區域秩序，取得與西方國家同等之國際社會主權地位，並形成其雙重認同的過程，至於小山仁美則指出，日本對於亞洲受難者愧疚態度，部分由於主流自由主義未能理解歷史的政治性之故，因為後者的本體論假設歷史中的主體是給定的，如同原子一般且能自給自足。

肆、華語圈國際關係的在地化理論建構

在此有 4 點可供觀察：(1) 在被援引最多的華語圈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中，對於建構一個中國理論之必要性並無共識。例如閻學通持反對意見，認為國際關係作為一種科學探索，理應普世適用而非只限於單一國家，至於凌煥銘則質疑中國國際關係學派的「中國特質」來自何處。有趣的是，例如石之瑜等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學者對中國學派所做的貢獻，往往在討論中被忽略，由此顯示出西伐里亞典範在國際關係學科中的持續支配性，亦即學者和實務界很難從固定疆域和民族定義以外的角度去思考「中國」。

(2) 相較凌煥銘和石之瑜等大陸以外華人學者與佛教、不二一元論、安地斯世界觀和京都學派等「非西方」思想之對話，大陸學者在建構在地化理論時對此並不感興趣。就中國學派理論的自我學術評價來說，英語圈與歐洲的國際關係理論仍是其主要參照點。此現象與日本在 2000 年代建構在地化理論時所做的努力相似。

(3) 儘管大陸學者在建構理論過程表達其「中國特質」時，似乎充斥著民族、國家和父權語境，值得注意的是，此種的「中國特徵」並非來自地緣文化真空所致，畢竟歐洲中心且具雄性意識的西伐里亞典範仍繼續影響著整個亞洲與結束帝國和殖民的中國。

(4)此處介紹的華語圈在地化理論者均不約而同地聚焦文化和關係性，儘管各自宏觀理論假設有所不同。閻學通、秦亞青和趙汀陽等中國學派的「三巨頭」皆由本質主義角度，指出「中國」（經常就等於儒家）文化中某種單一穩定之認同以及同步時間性。另一方面，凌煥銘和石之瑜則分別從後殖民主義和佛教的循環性時間概念出發，認為認同是流動、不一致和多重的。

伍、學術和政策話語中的日本思想、歷史和傳統

學術圈關於日本政治哲學和思想史的興趣，早就超出由政治學者支配的國際關係領域，並在愈來愈多人認知到國際關係理論過於向歐洲中心傾斜以前就浮現了。此種興趣源自現代日本政治哲學家努力與歐洲/德國/西方政治思想對話的結果，從而使其想法獲得更多人關注。然而，這也讓 Acharya 和 Buzan 想尋找一個針對國際政治思想之「非西方」且為日本（或中國、印度、韓國等）獨有之視角的努力，充滿問題與挑戰。³

研究現代日本哲學的學者雖通常從西田幾多郎入手，但近年來範圍逐漸擴大到矢內原忠雄及和辻哲郎等人。有坂洋子指出，由於西田幾多郎以「解放」作為壓制亞洲其他民族的理由與一般殖民論述相差無幾，致使其普世主義闡述未能與日本帝國主義切割。透過強調西田對日本超民族主義和西方政治思想的挑戰，以及其關於主體—客體二元論及絕對和相對之矛盾等思辨，Christopher Goto-Jones 在改變英語圈對西田哲學負面印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Richard Calichman 和 Harry Harootunian 等日本思想史學者曾對

³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Abingdon: Routledge, 2010).

日本的文化認同和資本主義現代化感興趣，不是因為他們想試圖解開「日本獨特性」的秘密，而在於檢視日本為克服現代性所做的（失敗）嘗試，從而更多地描繪出一個由西方主導的世界。同樣地，鈴木章悟則聚焦日本融入歐洲國際社會之「社會化」進程，指出它如何讓明治時期領導人決定侵略亞洲鄰國，以及理應提供與非歐洲世界和平共存之文明典範的國際社會「擴張」，結果卻無法遵守其自由化承諾；延續前述論點，堀田江理指出作為日本「十五年戰爭」意識形態基礎的「大亞洲主義」（Pan-Asianism），在 1930 年代被導向西伐里亞式國家中心典範前，最初或許不那麼狹隘粗暴。就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而言，勝間田弘和清水耕介皆同意，隨著日本文化被國家收編作為外交政策工具後，其正面潛力也跟著消失無散。

陸、學術和政策話語中的中國思想、歷史和傳統

過去 20 年來，將中國思想和歷史融入學術和政策話語的發展既不曾間斷，也不限於參與建構中國學派或是表明要建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們。至於大陸學者援引中國文化和歷史，為中國外交政策提供理論與規範性辯護更屢見不鮮；例如，代表官方的知識份子時殷弘，便經常為中國領袖提供正史紀錄之詮釋，並在其政策建議中，以歷史最為悠久的周朝作為成功典範，並以東漢末年的起伏作為寓言警示。在諸多取自中國歷史和傳統的理論和（或）政策暗示中，尤其在趙汀陽重新詮釋了相關概念後，「天下」概念及其運作內涵（例如朝貢體系）吸引了華語圈內外高度關注，例如尚會鵬試圖檢視「倫人」（具關係性的人們，意指人們並非原子化的，必須透過關係性得以存在）概念，並認定它作為數世紀以來建構東亞世界秩序之朝貢體系的心理文化基礎。

不僅 William Callahan 對中國知識分子為解決中國當下或未來的問題，從而操作（或創造）傳統的政治化習性多所批判，部分華人國關學者也對為解決實際政策需求，使用（或濫用）在地知識的問題感到憂心；例如，李揚帆和趙穗生便警告，不應誇示前現代東亞區域中天下秩序的「偉大性」，因為從現代/西伐里亞式角度詮釋帝制中國歷史，只會帶來適得其反的外交政策。

最後，在國際關係文獻中關於中國古典政治思想的探索，已逐漸普及並超越了儒家學說範圍。例如，閻學通對荀子（儒家）、Jeremy Paltiel 對孟子（儒家）、Peter Moody 對韓非子（法家），以及石之瑜和余帛燦探討公孫龍（名家）等，這些嘗試都尋求與既有西方國際關係和社會科學理論展開建設性對話。

柒、結論

雖然本文無法全面性針對學者和作品進行介紹，仍簡單勾勒了華語和日語圈建構在地化理論之潛力和障礙。儘管兩個知識社群建構理論的方式不盡相同，尤其學者和國家的興趣程度有異，兩者皆關注西方理論的支配地位、全球國際關係知識生產之研究議程，與西伐里亞現代性的問題。華語和日語圈學者雖選擇不同時間點嘗試克服現代性，最終仍無法擺脫再複製的結果。對此，中國學派和京都學派擁有驚人的相似性，都陷入被國家收服或濫用的危險。為免重蹈覆轍，華語和日語圈的在地化理論學者，可以也應該透過援引對方或彼此共享的想法和行為，追求互相學習和滋養，這在作者落筆之際或正逐漸發生當中；倘使如此，或能協助學者擺脫狹窄又粗暴的「中國的」或「日本的」侷限，以便追求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後西伐里亞秩序。